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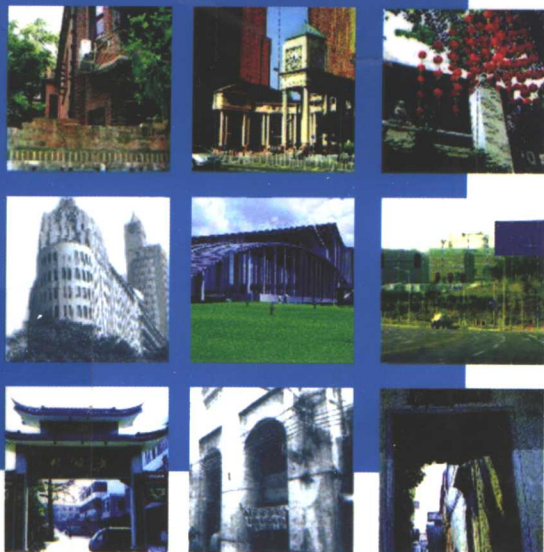
广州：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广州的深度组合

GUANGZHOU DE SHENDU ZUHE

李大华 周翠玲 编著

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广东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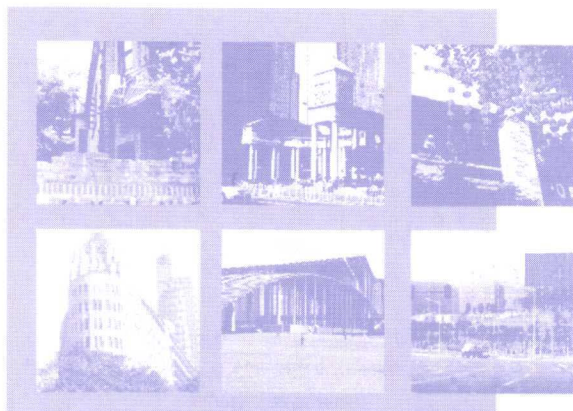


广州：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广州的深度组合

GUANGZHOU DE SHENDU ZUHE

李大华 周翠玲 编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1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州的深度组合 / 李大华, 周翠玲编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2

(广州: 文化与生活方式丛书)

ISBN 7-5406-5763-4

I. 广... II. ①李...②周... III. ①生活方式—概况
—广州市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7185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8.75 印张 180 000 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06-5763-4/D · 26

定价: 23.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目 录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代序）	1
一、从广交会到会展：八面来风的窗口	4
▶ “一口通商”成就的广州	5
“一口通商”与门户意义	5
广州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11
▶ 中国第一展	13
“一口通商”的延续	13
与广交会一起成长的广州生活	15
▶ 起飞会展：广州的国际化姿态	22
广交会还姓“广”吗	22
会展之都：广州的国际化方向	24
科技与人文建构会展中心	28
会展盛宴	30
二、报业晴雨：广州现象	33
▶ “叹报纸”：报纸改变了我们	34
与“一盅两件”同“叹”的报纸	34
读《羊城晚报》是一种生活方式	38
报栏、报摊百花齐放	41
▶ 生活渗透着信息	44
文化生活=信息生活	44

谁左右了我们的消费观	48
► 南风这样吹	50
南风这样吹着	50
“广州方式”的政论	52
► 没有硝烟的战争	54
从《广州日报》的经营神话说起	54
《南方都市报》的蜕变个案	57
从一场“新闻战”看广州报业的精彩出击	59
三、居住：一种生活态度	65
► 骑楼：广州符号	66
“马路主义”的拿来或继承	66
务实的“风雨廊”	67
► 居住方式的区域风情	69
以人为本的西关大屋	69
乡居方式的东山洋楼	72
与世界同步的华侨新村	75
► 居住革命：从弄潮到文化	77
先行一步的住房制度改革	77
跨越城区的地理与空间革命	81
天人相谐的理想	88
► 泛地产时代：房子二生活方式	89
选择了一类房子就是选择了一种活法	89
新都市主义	91



大盘运动与“郊区化”	92
老城区情结与“河南地”成“凤凰”	96
四、制造时尚与个性的声色娱乐	101
▶ “亦游亦商”：广州模式	102
繁华如梦造就娱乐世界	102
“游公司”演变成娱乐时尚	104
从商业到娱乐的夜市	106
▶ 粤味：覆盖或渗透	108
流行乐坛的“广州标签”	108
“美在花城”的质检报告	115
▶ 广州酒吧：自由生存状态	122
多元的酒吧群落	122
缤纷的酒吧秀场	125
寻找在广州的自由	130
后记	135



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代序）

不管存在着多么纷呈的看法，也不管理论的探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结果，广州人领潮流之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被人们竞相效仿。近二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无数人对广州的选择，其实就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而也就是对一种文化模式的选择。正如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是城市的文化模式。

显然，作为二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历史上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于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性与作为近代中国一度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的地位；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历史上，这一扑朔迷离中的异彩纷呈也正是岭南的特征。“九死南荒吾不悔，斯行奇绝冠平生”，如果这句诗不是被贬谪岭南的北宋大诗人苏东坡表达的浪漫和豪迈，至少也算是他对岭南山川奇胜所抒发的欣赏态度。确实，在北国人看来，自五岭逶迤以南，满目便是奇异的风土，充耳是哑哑的粤音，往来交接的是蛮荒的习俗。于是，南来的人多半会有去国怀乡的零落之感、孤篷万里的身世之悲，而真的久居下来了，却又像老马恋栈，尽管未“日啖荔枝三百颗”，也分明愿意“不辞长作岭南人”。实际上，岭南的偏隅不仅使它成为在中原以外的一方奇异乐土，而且成为了一个不易破解的矛盾的组合：既是瘴气蛮烟之地，又是物产丰饶的宝国；既是“蛮语”难越的边陲，又是张眼看世界的窗口。在政治命运和革命历史进程的选择中，一方面，岭南远离中国儒家伦理政治的中心，另一方面，在近代，却又责

无旁贷地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更成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前驱。

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岭南文化”随着岭南社会在近二十多年间的变化发展，逐渐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显学”，与各种地域文化相提并论。但在对岭南地域文化的研究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共识就是文化方式的“平民性”——渗透在茶香花香中的点点滴滴。

文化是依人而言的。在这里，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从文化是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总和的最基本的定义出发，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综合的生活方式而已。

在这一综合的生活方式中，敢为人先、先行一步不仅是广州人最重要、最突出的精神品质，而且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为特征。从历史到今天，这一精神引领着广州人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创造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而且，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开放的广州对人的尊重与包容、对生命自由的追求的精神内核，最适宜文化的创造与共享和人们的生存与发展。

因此，与其认为文化是一种理论指导，倒不如说，文化是广州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的品质追求、工商活动的展开以及城中人的故事都可看作是“文化”的体现与传承。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

本丛书旨在把“文化”从理论框架与抽象的描述中进行具体的还原，从“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角度揭示广州城市以及广州人的独特的价值观、文化精神以及审美趋向等。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文化被创造与享用的过程，更强调文化深入生活的各种细节与层次。它将层峦叠嶂地体现广州社会无与伦比的丰富性。故本丛书以如下的题目为宗旨：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谁引导了广州的文化潮流。

本丛书不进行理论抽象，而选择一批领潮流之先的“行业”现象作为载体，阐释广州的独步时代的必然性——也说明广州的被仿效，实际上人们对自主、多元、个性化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尊重。

第一卷以“广州的深度组合”为题，选择了会展业、报业、居住革命文化以及娱乐文化作为切入话题。

会展业主要体现广州作为中国窗口的意义。清末的“一口通商”、20世纪上半叶的“广交会”时期、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先行一



步……实际上，广州一直保持着瞭望世界的姿态。当今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第一展”的拓展，而且是借商贸之机，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会展业具有“窗口”的象征与符号意义——标志着广州在新世纪的国际化的姿态。

“报业”重在展示广州“文化”最民间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广州报业被称为“广州现象”，一是指其文化经营的模式，二是指广州人接受与运用“文化”的信息化特征。这部分呈现出广州人的“文化观”是以务实与变通为特质的。

居住革命与娱乐产业，一直都是广州大文化潮流中最具领先意义的。居住革命带给了广州人“买房子是为了享受人生”的新理念，颠覆了房子只是“住房”的传统观念；娱乐在制造流行文化的同时，也描述了广州人的生存状态。这两者都是广州呈现给世界的个性体现。

在第二卷《广州的平面解释》、第三卷《广州的质量报告》中将分别展示广州的精致丰富与追求卓越的品质。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总结了广州文化的三个特点：平民的而非精英的，本土的而非外来的，未完成的而非固定的。这样的阐释现在看来依然是恰当的。以下借用《南方都市报》对广州城市精神的解释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并作结本序文。

我们坚持认为，广州的城市精神需要重新叙说。这种叙说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如数家珍”的层面上，更不是为了制造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自恋，而是指向一种城市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往习以为常的所谓“平民精神”、“实用主义”乃至对于“岭南文化”的褊狭理解，在这里都要重新受到质疑。比如在广州“土著”潘达微身上，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广州精神的另一面。他既是勇敢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先锋艺术家；既是一位社会慈善家，同时又是一位看破红尘的出家人。凭着他的才能，他完全可以建功立业（无论是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艺术方面），但他却淡泊名利，毅然斩断尘缘。强烈的世俗关怀与超验的宗教情愫、宏大的社会理想与细微的艺术感受，竟然能如此天衣无缝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这个以自身生命的丰盈而超越了世俗归类、无法定义的人物身上，可能恰恰体现了广州文化失传已久的精髓。（2003年3月3日《南方都市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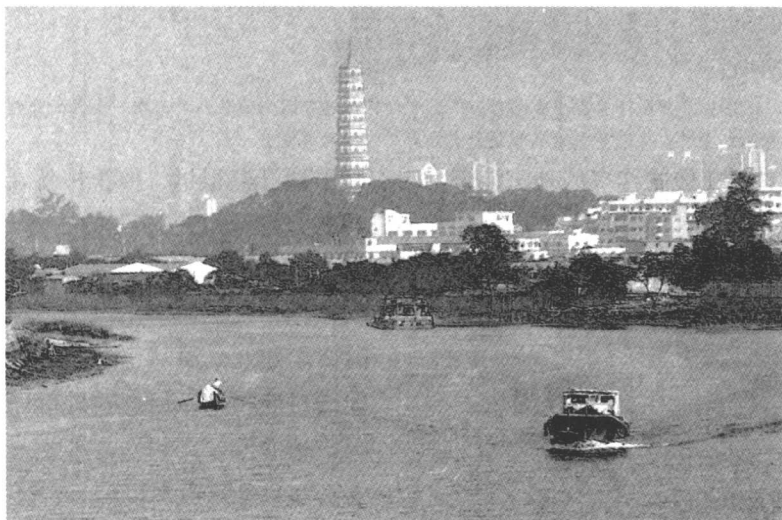
我们期望在日常中体察广州，在体察中发现潮流因我们而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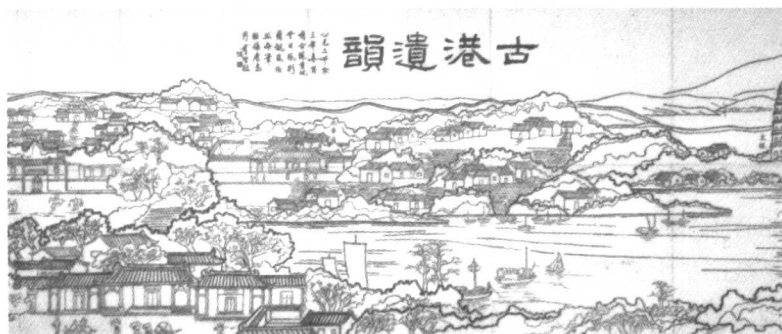
一、从广交会到会展： 八面来风的窗口

广州领潮流之先的城市精神与广州人“饮头啖汤”的勇气不仅源于广州面向海洋的开放性的地理优势，更由于广州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有两次特殊的机遇，让它成为古老中国大门紧闭后的唯一的窗口，成为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唯一的通道：一是清代一口通商时期，一是20世纪50~80年代的广交会时期。

“一口通商”成就的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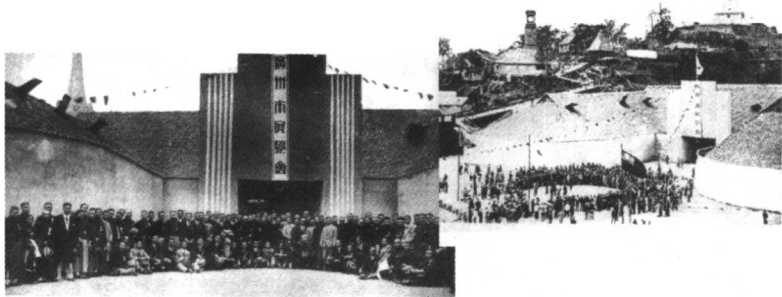
位于珠江以南的琶洲塔自明代以来就是广州的标志之一



清代的黄埔古港示意图

“一口通商”与门户意义

半个世纪以来,对广州城市的定位认知出现了各种的反复,但“千年外贸港市”这一历史定位从未被质疑过。广州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是历史最长的口岸城市,这是由历史、机遇、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由天时、地利以及人的因素共同造就的。



1933年2月15日至3月16日，广州市政府在越秀山一带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大型展览会。图为华侨参观团在展览会上合影（左）及展览会一景（右）

在中国许多的外贸港市中，有的虽然开港很早，但很快就衰落了；有的有着全国地位的大港，却是开港较迟的；只有广州开港最早，并一直保持着国内第一流的大港的地位。广州港四易港址，南海神庙是最早的港址，成为历史港市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

的标志建筑。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的封港闭关，但这些外部原因一旦消失，广州便立即恢复了它的对外贸易生机。

早在汉代，广州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在广州象岗山发现的南越文王陵墓，出土的银盒以及玛瑙、水晶等多种质料珠饰，有的是中亚



黄埔村古码头

或南亚的舶来品，则可见一斑。梁朝时，每年来到广州的各国商船有十多批，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另外还设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当时侨居广州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数以万计，最盛时达十万人以上。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在蕃坊（今广州光塔路）修建了伊斯兰教寺——怀圣寺。从五代到北宋，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明朝到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当时我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各个港口都关闭，广州便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



Wanpooh: 凤浦

提起“黄埔”两个字，不论广州人还是外地人，总会想起黄埔军校、黄埔港、黄埔区等。这些地名的来源，都和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东侧，东南环城高速公路旁的一条宁静的小村庄——黄埔村有着莫大关联。这个如今叫做黄埔的村子，经过专家们的考证，证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这条村一直以“凤浦”为名，到了清朝，众多外国商船跳下许多金发碧眼的“夷人”，这些夷人以他们的发音习惯，把这里称作“Wanpooh”，渐渐地以讹传讹，“凤浦”就成了“黄埔”，久而久之，原来的“凤浦”反而被忘记了。外国船与商人的到来，给本地带来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名的变化，更是一段中外贸易的历史。

唐代时广州的港口设在今黄埔南岗庙头村的菠萝庙，后迁移到了黄埔村。清代，黄埔村逐步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尤其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置粤海关，并在黄埔村南边的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后，黄埔村遂成了中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和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之所。琶洲岛上的琶洲塔就是当年商船的航标之一。

182年初次出版的《广州“番鬼”录》是美国人威廉·C亨特所著。他在1825年到广州，1844年返回美国。他在书里主要描述



《粤海关志》中的古
黄埔港地图

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外商在广州口岸活动的情形。书中所记均是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之事,内容涉及早期中西贸易以及中西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作者关于当日黄埔岛的记载——

是一个住有好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

“Canton”: 被世界认知的广州

早期中西贸易中合法贸易主要是茶丝贸易,《广州“番鬼”录》的作者分别在“茶叶”和“茶丝贸易”两节,列举了作为一个最具现代意义的口岸城市的“国际性”——积极地面向世界的姿态。如广州的旧英文译名“Canton”,被国外许多地方取为地名,可见一斑。

他举例说,当时流行一种广东英语——

这种广东英语“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进行商业贸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

它是在英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粤语的特殊表达而成的特殊语言,通行于广州与外国的商业贸易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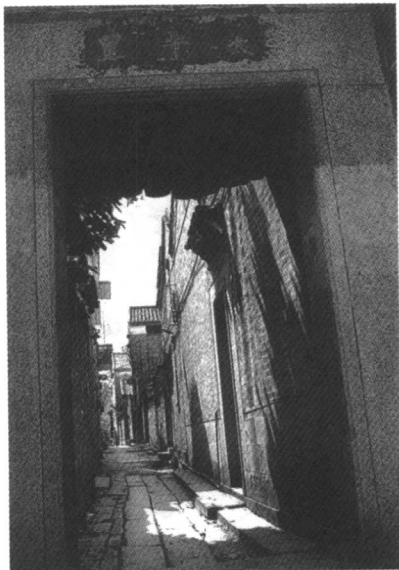
他观察到,在清政府的广州封建外贸体制之下,粤海关负责

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行商负责与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被指定为外国商船的碇泊所,澳门为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这4个环节相互联系,又各自形成一套传统,运作非常有序、符合国际惯例。

由他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时广州作为外贸大港所具有的秩序和规模。

从历史港市和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位看,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一直积极参与世界大

从南海神庙到黄埔村,是广州外贸历史的证物。



今日黄埔村
尚有古巷深深的
古韵



循环，培养了广州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显然，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选择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开放性与商业性并重，塑造了有别于内陆黄色文明的、面向海洋的“蓝色文明”风格。

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一元经济、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发展道路不同，近代以来面向世界的广州和珠三角走的是工商并重的道路。近代工业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侵入广州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首先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和规模化，替代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其次是珠江三角洲的多样化的自然条件，创造了多元经济。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赋予广州人重商的传统，而商业活动更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之一，从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程式。

明朝朝贡贸易时，专设驿馆接待来粤的外商，曾设泉州(来远驿)、宁波(安远驿)、广州(怀远驿)三处口岸，在广州的幌子埗所设的“怀远驿”就称为“夷馆”。清代沿袭明代的夷馆制度，主持夷馆的商行总称为十三行。康熙二十五年(1685)，曾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海关。从设立粤海关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十三行独揽广州外贸。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只保留粤海关一口贸易到五口通商开放的80年间，更总括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史称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

多元经济使商贸活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赋予广州人重商的传统，而商业活动更使广州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现代城市之一。



西方画家眼中的清代广州街景

子南库”之称。《广东新语》载有一首竹枝词对这一外贸盛况描写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一外贸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广州的贸易发展，更使广州最先领受西风洗礼。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保留粤海关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的“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间，对广州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面向世界的唯一的窗口，广州获得了与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先机，西方先进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炮术、物理学、医学、建筑学、美术等方面的新成就，由西方的传教士们先后带入我国，其中大部分学科登陆我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而广州加以融合改造，这对岭南、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决定了广州在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与领潮流之先的重要地位。

作为口岸的开放性意义不仅体现在贸易上，更是使广州社会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姿态，这一保持向外的姿态，在关闭了国门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更显示出“门户意义”以及瞭望的前瞻性——这也是广州在开放之初能够迅速地与国际接轨的历史原因。

“门户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下来。1957年起每年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使“一口通商”以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广州延续，全中国都是通过广州这一八面来风的窗口瞭望欧风美雨。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交会与花城花市一道，成为广州土特产，是广州“制造”的典型。

作为时代风向标的“外汇券”

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到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的外汇券，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形式，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凭此，广州人可以在“友谊商店”购买到“进口货”或者是“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通过这些货品，广州人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更深刻的意义是通过港澳这个窗口，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不被切断，这才是开放之初“港风”的“香

广州人的故事一

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张“代用券”。这种“代用券”在改革开放初期可是个宝贝，用它不仅可以到广州友谊商店或海员俱乐部买到国内一些紧缺的名牌商品，如凤凰牌自行车、“白猪仔”牌午餐肉等，还可以买到国外的巧克力。这种“代用券”的全名好像叫做“外汇兑换券”，是海外的人到广州消费，用外汇兑换成与人民币等值的货币，使用者基本上是外国人和港澳人。广州人一般都会有亲戚在港澳，如果碰巧是回来参加中国出品商品交易会的，就会持有“代用券”。有一次，亲戚参加广交会时刚好碰上我父亲过生日，他送了50元“代用券”作父亲的生日贺礼，我们便由此有机会到友谊商店去购买那些被我们誉为“高级商品”的东西。

记得当时妈妈买了几包“公仔面”、爸爸买了一包剃须用的“吉列”牌的刀片。这些“代用券”我们当宝贝一样珍藏着，一直不舍得乱用。想不到，就这样藏在衣箱底，至今虽然无用，却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李梅 广州人）

香臭臭”问题不成为“广州人的问题”的内因。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驶上了参与世界循环的轨道——如果说这个时候，清代“一口通商”与20世纪50年代的广交会是开放的“窗口”的规模，那1978年改革开放，则是全面地门户洞开。至此，广州历史与当今的承担的“一口通商”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带给了广州无可替代的开放姿态。



广州人手中的各种面值的外汇券，已经成为收藏品

广州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一口通商”的近八十多年间，对广州产生的另一方面影响，正如下文所认为的：

主导当年十三行的“广州制度”，在维护中国经济贸易主权中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外商们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这与鸦片战争后在租界内的管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有着制约贸易发展的局限性，如对外商行动限制过严，不准家属住夷馆等。18世纪60年代起，欧美工业革命经济腾飞，而在1757—1842年间的独口通商，造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4日）

这一影响表现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出现的地区性的地位变化。

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同时对外开放，广州独揽中外贸易的制度随之瓦解，外贸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香港的优势地位也随之消失。事实上，从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国内外贸易的首席地位。如这一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而广州仅占13%。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这一地位从未被动摇过。也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广州社会近现代的“西化”方式与上海不尽相同。